

【文学与艺术研究】

神圣仪式与文学经典*

——论司马相如《封禅文》的创作与经典化

王允亮

郑瑞娟

摘要:封禅是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国家祭典,西汉武帝中期全国上下封禅思潮涌动,司马相如在时代氛围影响之下,以撰作经典的心态写下了《封禅文》。此文渊雅堂皇,从天人之际论述了汉代封禅的势在必行,成为封禅文类的典型垂范后世。中古时期历代君臣封禅情结浓厚,《封禅文》也被不断地接受、阐释、应用,保持恒久的经典地位,并逐渐获得盛德之事的符号意义。宋代以后,即使封禅热情不再,《封禅文》也颇受非议,但其文学经典的地位依旧无可撼动,清人仍将其录入文章选本欣赏学习。作为封禅文学的经典,《封禅文》在数千年间被崇奉学习,成为中国文坛上的独特存在,散发出异样的光彩。

关键词:封禅;《封禅文》;国家祭典;盛德之事;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2-0141-08

封禅是中国古代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国家祭祀大典,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盛世之举。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祭祀仪式,“封禅”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当为战国时齐地士人为天下一统而设计的礼仪制度。它源于古时的帝王巡狩及山岳崇拜,后来与神仙学说结合起来,成为君主追求长生、彰显威权的一种手段。《汉书·艺文志》有《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沈钦韩以为即《管子·封禅篇》之类^①。秦汉时期,封禅思潮盛极一时,并发展成为富含政治文化意味的学说。封禅作为帝王统治臻于极盛、功成告天的一种祭典,引起士人的无限向往。《五经通义》所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②,即是这种理念的简要表述。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等皇帝,都曾亲自举行过封禅大典。

封禅作为一代大典,在中古时期为各代统治者所重视,以其为核心衍生出不少文学作品。在这些

作品中,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最著名的一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于《封禅文》这样记载: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③

司马迁行文特意将《封禅文》的来历和墨托出,足见在其眼中,此乃司马相如一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字。《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下》也有相关记载,所言略同乎《史记》。其文字出入较大者,《史记》“若不然,后失之矣”,《汉书》作“若后之矣”;《史记》“奏所忠,忠奏其书”,《汉书》作“所忠奏其书”。关于前者,李慈铭云:“《史记》作‘若不然,后失之矣’,文意甚明,此只少三字,便卒不可解。”^④就后

收稿日期:2020-07-27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经典化视阈下的汉代文学研究”(16BZW089)。

作者简介:王允亮,男,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450002)。

郑瑞娟,女,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郑州 450002)。

者的不同来说,则是《汉书》省略了相如家人付书与所忠的过程,叙述较《史记》简略。由此可见,《汉书》相关文字明显因袭《史记》,这固然与《汉书·司马相如传》以《史记》为主要材料来源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与司马迁一样,班固也认为《封禅文》是司马相如一生中的重要文字,值得特意表出此事。

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同时被《史记》和《汉书》全文收录,在以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两汉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对于上下数千年的通史,还是对于前后二百年的断代史来说,材料的选择都需要十分审慎,但他们均花费如此大的篇幅将其全文逐录,足以说明无论是在作者司马相如心里,还是在史家司马迁、班固眼中,此文都是一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作为盛德之事的代表,《封禅文》的产生及其经典化历程,颇有可以探究的地方,本文即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世而后仁”与功成告天:《封禅文》的产生背景

封禅思想在战国晚期风靡一时,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受燕、齐海上方士的鼓动,开始将其付诸实施。到了汉代,随着大一统帝国的日趋稳固,封禅作为王道大成的象征,其影响也日渐扩大,至武帝时终于形成轰轰烈烈的封禅运动,并于元封元年(前110)成功进行封禅。接下来我们就西汉时的封禅活动进行考察,以了解《封禅文》创作的时代背景。

1. 文帝及武帝初期的封禅尝试

《史记·封禅书》记载:“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事,不可得而数者万数。”说明封禅虽为齐人提出,但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在秦汉之际已为燕人韩婴所吸纳。《史记·封禅书》又言:“《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陈乔枬云:“《史记》所引《诗》即《鲁诗》说。据《封禅书》言,上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绾、臧并申公弟子,益足证《鲁诗》以《般》为言封禅事矣。”^⑤由《鲁诗》学派赵绾、王臧当时的举动可以看出,随着入汉以来封禅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儒家已借其祭祀天地的礼仪特点,来构建自己的大一统

政治文化理念。

自文帝时起,汉人开始在政治事务中将封禅提上日程。《史记·封禅书》记载:“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这是文帝时谋议封禅的记载,然而主导这次封禅的实为方士新垣平,与儒家的关系并不大。新垣平对文帝多采取欺瞒哄骗的办法,后来他因事情败露被诛。《史记·封禅书》云:“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⑥由于此事的发生,文帝对封禅失去了兴趣。

武帝即位初曾有封禅之意,但为窦太后所阻挠。《史记·封禅书》记载: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⑦

据此,似窦太后之反对赵绾、王臧乃因学术取向不同,然仅以此而致两名大臣自杀,其后果则似嫌过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言当得其实:“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窦太后反对赵绾、王臧,除了儒术与黄老的学派分歧外,窦太后与武帝对朝廷控制权的争夺,应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赵绾、王臧由于鼓励武帝自立摆脱窦太后的控制而受到迫害,最终不得不自杀,他们所提出的封禅设想自然也不了了之。

2. 武帝中期的封禅活动

随着窦太后去世,武帝成为汉帝国的最高掌权者,至其中期,封禅思潮再起,成为一股影响整个时代的洪流。这一方面是因为汉朝国势空前强盛,需要有合适的仪式行为,进行文化上的升华定格,以揭橥其不世的伟业,而封禅正好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和儒家传统经典中与政治文化相关的时间节点有密切关系,武帝中期恰好与这些形而上的节点相契合,因而引发了时人以封禅活动来标榜盛世的政治热情。

自汉武帝元光年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

在朝廷意识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所奉经义成为治国理政的依据。在讲到君主治国之成效时,《论语》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注意。一是《论语·子路》所云:“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⑧“诚哉是言矣。”⑨“残暴不作,刑罚不用,自然是上下和谐的清平盛世。《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鲁二生亦云:“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制礼作乐一向被认为是王道大成的象征。这也说明在时人观念中,百年是一个王朝统治显出成效的时间节点。自西汉建立至武帝元封年间(前206—前110),时间将近百年,按照《论语》所言,汉代已经到了“胜残去杀”、以德化人的理想境界,即使如鲁二生所言,也可以进行礼乐的建设了,其统治渐臻大成自不待言。

二则是《论语·子路》另一章所云:“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安国注云:“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⑩《汉书·平当传》载平当上书言:“臣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可见,汉人同样是以三十年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自武帝即位至元封年间(前140—前110年),恰至三十年之节点。汉武帝中期与这两个时间节点的重合,尤其是后者,被时人认为具有特殊的天定色彩,促使汉人考虑通过仪式化的活动,彰显武帝统治的辉煌成就,具有天人相应性质的封禅,自然是不二之选。晋代王婴《古今通论》曰:“太山上为天门,值户,户为明堂,圣帝受天官之宫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则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石纪号。”⑪此言虽出于后人,颇能体现汉人当时的心理。东汉光武时期的君臣,遵循的也是这个思路,《东观汉记》卷一载:“三十年,有司奏封禅。诏曰:‘灾异连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叹,而欲有事于太山,污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三十二年,群臣复奏宜封禅,遂登太山,勒石纪号,改元为中元。”群臣在光武帝统治三十年的节点上,同样不失时机地提出,皇帝应该举行封禅仪式,彰显自己的统治功绩。这一活动的时间性,与“世而后仁”的时间节点同样密切相关。

受此思潮影响,武帝将要封禅,成为当日士人阶层的共识。《史记·封禅书》记载:“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肃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时,时加一牛

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⑫《史记集解》引徐广注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由济北王的举动可以见出,在武帝即位将近二十年的时候,臣子已经窥知他将要进行封禅。这说明无论是当时的大臣还是皇帝,都已有封禅的心理准备。据《史记集解》引徐广注,到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本人通过种种措施,将五岳全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通过独掌五岳祭祀来凸显皇权的尊崇。这个时候,封禅已经呼之欲出⑬。

最终,在元封元年(前110),汉朝上下期待已久的封禅大典成功举行。《汉书·艺文志》载:“《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这里所说《封禅议对》当为汉廷议封禅之事的结集。《汉书·儿宽传》也有“议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的记载。《汉志》又有《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此当为汉武帝封禅礼仪规章的记录。

汉武帝的封禅活动给时人带来极大震撼,《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一段记载,颇能反映当时人们对封禅的向往: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⑭

司马谈因疾病缠身,无法亲至泰山目睹武帝封禅,成为他一生的重大遗憾,其遗言中“是命也夫,命也夫”两句感慨,包含了无限的怅惘之情。而司马迁在听受了父亲的嘱咐之后,即使在其父即将病故的情况下,也没有更多停留,而是直接起身去追赶武帝封禅的队伍。这固然是由于他有公务在身,需要向武帝禀报出使西南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能亲睹武帝的封禅活动,他后来行文中也特意言及自己参与封禅。由此也可以看出封禅在当时的士人心目中,是何等重要且神圣了。

司马相如作于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的《封禅文》,就是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⑮。那么,相如为何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又为什么特意嘱咐家人死后也要献给武帝呢?这一点非常值得探究。

二、经典意识与经典书写：《封禅文》的撰作

如史书所载，司马相如歿后也要家人献上《封禅文》，对其个人来说，此时当无实际利益的考虑，那么他为何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又为何死后也要让家人献上呢？他创作《封禅文》是抱有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他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此目的？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探究。

1. 文章不朽：《封禅文》的创作心态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相如之称病闲居，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汉代的官员选举，对于仪表言行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现存的博士铨选保任书中即有“无金痍痼疾”等身体方面的要求。相如虽不至因口吃失去做官资格，但对于渐重容止语言的汉廷来说，口吃终归是一个劣势^⑮。尤其是作为文学侍从之臣，言谈方面的先天缺陷，让他无法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一点影响甚大。

第二，相如并非才思敏捷型作家，在具有时效要求的即兴写作场合，这也是一个容易凸显的劣势。《汉书·枚乘传》载：“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⑯

第三，东方朔、枚皋这些仅靠文辞娱乐皇帝的言语侍从之臣，在当日实无尊严可言。《汉书·枚乘传》载：“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嫫东方朔，又自诋嫫。”^⑰《汉书·严助传》载：“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⑱相如虽因称疾避事，地位稍优于枚皋和东方朔，然即使他不如此，也不过跟二人一样，只是被武帝视为俳优而已。

相如既然不问世事，何以又预先创作《封禅文》，即使死后也要家人献给武帝呢，他在创作该文本时到底持一种什么心态呢？这一点颇值得讨论。司马相如虽称病不参与朝廷活动，并不代表他没有用

世之志。在他所受的教育中，儒家思想占很大的比重。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言曰：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⑲

此处言相如曾制封禅之礼固属不确，但若说相如因受儒家思想影响，因而有参预世务的有为之心则大致不差^⑳。在写于元朔元年（前 128）的《难蜀父老》文末，司马相如有这么一段话：“然则受命之符，合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这说明他对武帝将要封禅早有预见。在旷世一遇的封禅即将到来，士人无不欢欣鼓舞时，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参与这激动人心的伟业，在这个神圣仪式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撰作文章便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与封禅活动开启历史新纪元相应，司马相如创作《封禅文》也应当有参与不世伟业的神圣使命感。非常之业需要有非常文字相衬，封禅对于时人来说固然是从未有过的盛事，此文又何尝不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大手笔？这促使相如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创作，因此他才会耗尽心血写成这样一篇文章。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郑重其事地嘱咐家人，身后也要将文章上于武帝，因为这篇文章倾注了他参与历史进程、实现人生价值的深远期许。

相如的这种心态，前人也曾论及，明凌约言云：

相如《封禅书》，议者谓其至死献谏，然予观太史公《自序传》，其父谈曰：“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是知当时以登封为盛，有事为荣，盖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当代，见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兴乐章，度其必封禅以夸耀后世。当其时，谓可秉笔托附不磨，由是草书，将以上劝，而不幸病以死，则初意不获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于是属其妻身后上之。^㉑

就相如的心态而言，无疑是希望自己精心结撰的《封禅文》，能和武帝的封禅盛事一起流传后世，供人瞻仰崇奉，自己亦因此而不朽。清代何焯在《封禅文》眉批中亦言：“就群臣口中说请封禅之意，以符瑞为验，而归于一艺以垂鸿名，是亦文人本怀也。”^㉒何氏亦指出相如欲以文章名世的心态。这两段话均能体会相如创作《封禅文》时熔铸经典，以求

文章不朽的隐衷,绝非后世那些谓其导诱邀宠,轻加讥讽之类的评论可及。

2. 天人之际:《封禅文》的书写

相如虽有撰作经典垂范后世的心态,但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体,如何进行书写方能与封禅活动的神圣庄严相称,却需要作者的覃精研思。如果就具体的写法来说,《封禅文》文末有“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之语,因此文章的着力处,也主要从天、人两方面入手。

天的方面主要体现为文中的符瑞意象,如:“然后圉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觥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奇物譎诡,倏恍穷变。”这段话涉及驹虞、嘉禾、翠黄、乘龙等瑞应,通过它们将汉统治得上天嘉奖的情状绘出,从而彰显出其统治的兴盛祥和。这也成为封禅类文字的特色,为后世同类文章所沿袭,《文选》因而将这类文字命名为符命,并招致后人的讥诮^②。殊不知封禅本来就讲天人之际,符应则是天人沟通的表征,此乃这类文体的固有特点。另外,司马相如对应应的重视,也是当时符瑞文化的体现。

武帝时推动封禅的有两股重要力量,一为儒生,一为方士^③,二者都热衷于讲符瑞。关于前者,刘师培云:“观公玉带献《明堂图》,倪宽草封禅礼仪,司马相如作《封禅文》,咸因汉武求仙之故。虽然,秦皇求仙,仅重礼仪;汉武求仙,兼言符瑞,而儒书多言受命之符,其说与邹衍之书相近。故儒生之言礼仪者,一变而为言符瑞。言礼仪,出于祀神,言符瑞,亦出于祀神。而汉儒言符瑞,则由逢迎人主之求仙。”^④关于后者,陈槃云:“秦皇、汉武世之方士,即传邹衍术之方士,神仙符应之说,皆出此辈,卢生、徐市、公孙卿、李少君等其尤著者也。秦皇、汉武凡封禅、求仙、祠祀、符应之事,皆此等方士怂恿之结果。”^⑤可以说,《封禅文》对符瑞的彰显,除了封禅活动本身具有天人交接的性质之外,也是当时朝野上下争言符应风气的体现。

除了用符瑞彰显天意外,《封禅文》还从人事的方面,论述了封禅的必要性。具体做法则是将汉代统治放入历史序列,凸显其空前绝后的伟业。在将汉代统治与历世相较时,司马相如先从天地剖判开始,“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穷兮生民。历选列辟,以迄于秦”,呈现出独立历史长河之上,回观过往的宏

大时空观念。接下来,他又特意选取周朝作为历代统治的杰出代表:“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尧,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凌迟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并在周、汉间通过符瑞等方面的比较,宣称汉远胜于周,已开创旷古未有的历史盛世。

司马相如在比较汉、周优劣时,采取了一种抑彼扬此的手法,对于周、汉的统治进行抑扬。文中在叙述汉代符应之盛后言:“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恶乎?进让之道,何其爽欤?”下又借群臣之口言:“陛下谦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恶焉。”这两个“恶”字先后出现,形成一种对比的张力,周因封禅而恶,汉因不封禅而恶,让人体会到周、汉之间的巨大差距。通过周朝尚且封禅,来论证汉朝更应该进行封禅。何焯评云:“以周比汉,两两相形,见汉之谦让未遑处。”^⑥包世臣总结文章写作技法,曾点出垫拽一法:“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⑦司马相如的这种论证技巧,正是垫拽法的体现,通过抑扬对比,让人认识到汉代封禅的势在必行,为它的到来壮声威。

在司马相如的观念中,汉家统治与其将要进行的封禅之事一样,是超迈往古的鸿业。与汉之旷世伟绩相应,他通过渊雅堂皇的文字,大气磅礴的史观,开创了一种经天纬地的宏大赋颂文体,为后世封禅文字树立了典范。清代姚鼐评此文云:“《封禅文》相如创为之,体兼赋颂。其设意措词皆翔蹶虚无,非如扬雄之徒诞妄贡谀,为蹶实之文也。通体结构,若无畔岸,如云兴水溢,一片浑茫骏逸之气。观扬、班之作,而后知相如文句句欲活。”^⑧姚氏此评,准确地概括出了《封禅文》的艺术风格。

三、盛德之事:《封禅文》的经典化

西汉以后,封禅作为统治大成的体现,在政治文化中得到了成功的建构,具有了新型国家宗教的性质。东汉以后至六朝隋唐期间,历代皇帝、大臣都有很深的封禅情结,凡国家稍微安定之后,他们多谋求通过封禅宣扬皇朝勋业的隆盛。与具有神圣色彩的封禅相应,《封禅文》也被赋予了崇高地位,在士人间接受、阐释、应用,具有了可代表盛德之事的符号

意义。宋代以后,《封禅文》虽然在朝廷政治生活中丧失了实用意义,但作为对国家神圣仪式的经典书写,其文学价值却得到凸显,受到后人的无限推崇。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一情况进行考察。

司马相如《封禅文》问世后,立即引起时人的注意。先是汉武帝读其文异之,并如其所言实行了封禅之礼。及至武帝之末,司马迁在著《史记》时,更是将此事视为相如一生中的大事,在其传记中予以郑重书写,并全部誉录其文。至东汉时,班固也沿袭这一做法,将此文收入《汉书》。作为史学名著的《史记》《汉书》同时收录此文,保证了这篇文字可以随正史并存,避免了亡佚失传的危险。

因《封禅文》关注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宏大命题,为朝廷典章不可缺少的大手笔,更因其瑰丽飘逸的文风,很早便引起别人的模仿,扬雄在《剧秦美新》序中言:“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常有颠胸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③扬雄此语明白点出,自己创作《剧秦美新》是受了《封禅文》的影响。班固《典引》也借鉴了《封禅文》与《剧秦美新》,其序言中还记载了汉明帝的一封诏书:

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④

在明帝诏书中,司马相如临终献书的行为,具有了忠臣典范的意义,为可堪表彰的臣下法式,这当然是对《封禅文》意义的另一种解读,但因其皇帝的特殊身份,这种解读自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典引》序又言:“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无实,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这说明班固在创作《典引》时,对《封禅文》和《剧秦美新》有所参考。

班固之后,《封禅书》的创作汉代有杨终,《华阳国志》卷十上:“章帝东巡,又上《符瑞诗》十五章。制《封禅书》。免还乡里。”^⑤三国时邯郸淳、曹植亦有同类创作。《文心雕龙·封禅》云:

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

寡,飘焰缺焉。^⑥

西晋时则有李宠和张华的类似创作,陆云在给哥哥陆机的信中说:

寻得李宠劝封禅草,信自有才,颇多烦长耳。令送间人,又有张公所作,已令写别送。临纸周周,不知复所言,谨启。^⑦

云再拜,顷得张公封禅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无比,恐非其所作。^⑧

至刘宋时,仍有模仿《封禅文》的类似创作。《宋书·宗室传》载:“临川王义庆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这里的《典叙》显然是《封禅文》之流裔。《宋书·礼志三》所载大明元年(457)江夏王刘义恭《请封禅表》,更是直接受《封禅文》之影响。

除了出于实用目的而写作此类文章,《封禅文》的创作还被作为一种判定才能优劣的标准。《太平御览》卷六百记载:

《北齐书》曰:魏收,巨鹿人,以文章见知。曾奉诏为《封禅文》,收对曰:“封禅者,帝之盛事。昔司马长卿尚绝笔于此,以臣下材,何敢拟议?臣虽愚浅,敢不竭作。”乃于御前,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黄门侍郎贾思问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⑨

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司马相如的高超艺术成就,《封禅文》与封禅活动一起构成一个富有文化意义的盛举,引起后人的崇奉和追慕,以模拟和续写为荣。降至唐代,由于国势日臻强盛,这一文类的创作队伍更加庞大,不仅有许敬宗、上官仪、李百药、岑文本、高若思的《劝封禅表》以及朱子奢的《请封禅表》这样的正格,还有李峤的《大周降禅碑》以及苏颋、崔融的《贺封禅表》之类的变体。

除了被不断地借鉴仿作,《封禅文》也因其与封禅活动的关联性,在中古时期获得了盛德之事的符号意义。《宋书·袁淑传》记载:

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⑩

袁淑欲效仿司马相如撰《封禅文》献给皇帝,这自然是想表现臣子的忠心,但在帝王角度,“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的回应,无疑表明,因其所蕴含

的强烈封禅意味,此文已被赋予了神圣的政治文化寓意。

如果说模仿相如创作《封禅文》献给帝王,可以歌颂其统治勋业隆盛的话,那么背诵《封禅文》也同样具有表彰帝王功德的效用。《南齐书·王俭传》记载: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効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③⑧}

《南史·陈本纪》下记载:

及从东巡,登芒山,侍饮,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川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隋文帝优诏谦让不许。^{③⑨}

在陪同隋文帝登芒山侍饮时,南朝降君陈后主欲效司马相如献《封禅文》以表款诚。可以说,这个时候《封禅文》的创作、使用,因代表对盛德之事的歌颂而为人所接受,《封禅文》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恒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符号。

《封禅文》因长期被借鉴、阐释、应用,逐渐获得与《诗经》之《大雅》《小雅》等量齐观的地位,其经典地位已无可撼动。《新唐书·崔日用传》记载:

会帝诞日,日用采《诗》《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献之,藉以讽谕,且劝告成事。^{④①}

同时,随着文章选录和文学批评风气的兴起,《封禅文》也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引人瞩目的表现。萧统《文选》有《符命》一类,列《封禅文》为第一篇,唐代的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等对此文均有引用。在文学批评方面,任昉《文章缘起》以《封禅文》为此类文章之始。《文心雕龙》更是专门有《封禅》一篇,并言“相如《封禅》,蔚为唱首”,“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标明其开创之功。这些文章编选及批评的情况显示,由于六朝封禅思潮的兴盛,《封禅文》作为此类文体的开山之作,无论在批评还是创作中,都是无法绕过的经典作品。

宋代以后,虽然热衷封禅的思潮已经退去,但《封禅文》的文学经典地位已经确立。即使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道学人士对于文人的诋责较以前更为尖锐,司马相如也因创作此文遭受了不少批评,但批评家们仍不得不承认此文的艺术价值。

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明代陆时雍《古诗镜》卷二中的两条评论:

颂之体穆以渊,相如《封禅》出之便便,时多谀言,有德君子故所不道。不然,以此篇之体大思精,亦駸駸乎雅颂之侔矣。

汉人劲骨深衷,司马氏出之芳润,生情生色,神与之沛。^{④②}

陆氏一方面强调《封禅文》“多谀言,有德君子故所不道”的不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其“生情生色,神与之沛”的艺术效果,体现出他受理学观念影响的矛盾心理。

当然,如果摆脱理学思维的干扰,单纯从文学角度来评价,《封禅文》的艺术价值则备受推崇。李兆洛《骈体文钞》中的评点可为代表:“袭旧六为七,此是何等志趣!海岳瑰状,金石奇声,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以允答兢业立意,故极波涌云乱之观,而仍字字有归宿,此意扬、班已不能窥,况其下乎?”“迈往之韵,峻绝之骨,奇宕之气,萧疏之神。颂语不袭商周,几欲抗手。”^{④③}其评价之高不待多言。

通常来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一般具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在原因一般包括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外在原因则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等^{④④}。

由于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封禅文》拥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随着封禅行为的国家宗教化,中古时期的帝王、大臣多对它充满热情,这为《封禅文》的接受营造了极佳氛围。自《封禅文》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汉武帝的另眼看待,汉代的两大史学名著《史记》《汉书》均对它全文载录,保证了它在中古时期的广泛传播。创作上,扬雄、班固、杨终、邯郸淳、曹植、魏收等一大批作家不断对它进行模仿、学习,形成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封禅文类。由于与封禅的紧密关系,口诵或仿写《封禅文》被作为盛德之事的代表,渐渐具有了符号化的象征意义。文字模仿之外,在如《文选》《文章缘起》《文心雕龙》之类的结集、评点著作中,它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因与封禅的密切关系,《封禅文》在中古时期衍生出形而上的神圣意义,始终居于文学殿堂的高处,供后世接受、阐释、使用。宋代以后《封禅文》的实用价值虽不如以前,但其文学经典的地位仍然无可撼动,作为汉代鸿文的典范不断供后

人欣赏、学习。总而言之,作为政治与文学交互作用的经典,《封禅文》是长时间在中国文坛上散发璀璨光芒的独特存在。

注释

①④〔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2921、4191 页。②此据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见〔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623 页。③⑥⑦⑪⑬〔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687、1655、1656、1659、3972—3973 页。⑤〔清〕陈乔枏:《鲁诗疑说考》,《续经解毛诗类汇编》,艺文印书馆,1986 年,第 2550 页。⑧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年,第 530、531 页。⑩⑬〔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434、2701 页。⑫武帝中期,朝中大臣和武帝本人均以其即位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在文治武功各方面加快进程,以期完成封禅的准备。可参阅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必世而后仁’与封禅告成”一节,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65—272 页。⑭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67—168 页。⑮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载博士举状有云:“‘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见孙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26 页。博士官如此,其他官职也应有相应要求,《后汉书·张鹞传》载,“郡吏王青者,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举”,即是此例。阎步克《中古士族的容止崇尚与传统选官的以貌取人》一文,有论及汉廷铨选官吏的身、言方面的要求,可参考。阎文载《国学研究》第 15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⑯⑰⑱〔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367、2367、2775 页。⑲〔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年,第 973 页。⑳严可均云:“如宓此言,蜀地经师,长卿为鼻祖。而《史》、《汉》叙儒林授受,不一及之,以词赋掩其名耳。古之振奇人,文章必从经出,故援《蜀志》以发其端。”见《严可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14 页。鲁迅言:“盖相如尝从胡安受经,故少以文词游宦,而晚年终奏封禅之礼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

56—57 页。二者均指出相如的经学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㉑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33 页。㉒〔清〕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许逸民:《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第 5 册,广陵书社,2013 年,第 326、324 页。㉓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曰:“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5 页。㉔《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清沈钦韩曰:“此方士所本。史迁所云‘其文不雅驯’。”见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3004 页。余嘉锡称:“武帝本信方士之说,以为封禅不死,而诸儒顾牵拘《诗》、《书》,故武帝遂罢而不用。疑此十八篇者,皆方士之言,所谓封禅致怪物与神通,故其书名曰方说。方者方术也,犹李少君之祠灶谷道却老方,齐人少翁之鬼神方云尔。其诸儒所采《诗》、《书》古文之说,当不在十八篇矣。”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76 页。㉕刘师培:《国学发微》第二十六,《仪征刘申叔遗书》第 4 册,广陵书社,2014 年,第 1423 页。㉖陈槃:《古文献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95 页。㉗〔清〕包世臣:《文谱》,《艺舟双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年,第 4 页。㉘〔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宋晶如、章荣注释,中国书店,1986 年,第 1191 页。㉙〔梁〕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 年,第 678—679、682 页。㉚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535 页。㉛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394 页。㉜〔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 年,第 2045、2043 页。㉝〔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35—1836 页。㉞〔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35 页。㉟〔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10 页。㊱〔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330 页。㊲〔明〕陆时雍:《古诗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11 册,第 15 页。㊳〔清〕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书店,1988 年,第 46—49 页。㊴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责任编辑:采薇

Sacred Rituals and Literary Classics

—A Discussion about Creation of Sima Xiangru's *Fengshanwen* and Its Canonization

Wang Yunliang

Zheng Ruijuan

Abstract: Fengshan was the national ceremony with sacred symbolism, and in the middle of Hanwudi's reign, the thought of Fengshan surged. Influenced by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Sima Xiangru wrote *Fengshanwen* with the solemn attitude of writing a classic work. This article was profound and elegant, and argued that Fengshan must be held at that time through both ways of heaven and people.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genre, it spread widely and was established as a model for later generations. The complex of Fengshan was deep-rooted in Medieval emperors and officials, so *Fengshanwen* has been accepted,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continuously. It kept its classic status all the time and was considered the symbol of great virtue gradually.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e passion for Fengshan was not intense any more, and *Fengshanwen* was quite controversial, yet its status as a canon was never unstable and the people of Qing Dynasty still recorded it into books for study and appreciation. As the classics of Fengshan literature, *Fengshanwen* was adored in thousands years, and it radiated brilliant glory as the unique existence of medieval literature.

Key words: Fengshan; *Fengshanwen*; national ceremony; symbol of great virtue; canonization